

访谈 | 郑国恩
郭森

中国民主季刊

第2卷 第4期
2024年10月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但须注明
作者与出处，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新疆真相：从新疆 公安档案到人权危 机的深度解析



郑国恩



郭森

编按 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郑国恩博士 (Adrian Zenz) 的深度调查报告《新疆公安文件》，曝光了中国政府对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大规模监控和拘禁行动，为世界了解新疆地区的人权危机提供了关键证据。北京方面对外界的批评充耳不闻，并将其再教育营、强制劳动和高科技监控等措施的实施，描绘为反恐和去极端化的必要手段。受《中国民主季刊》委托，加拿大在读历史博士郭森 (Paul Gosselin) 先生就新疆问题的根源、政策演变及国际社会的应对等问题，与郑国恩博士进行了深入讨论。

郭森 (以下简称郭): 郑博士，感谢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中国政府一直坚称这些所谓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是旨在为打击穆斯林少数极端主义势力而设立的，而国际观察员和研究人员则认为，这实际上是对少数民族文化、宗教身份以及基本人权的严酷打压。您能简要总结一下过去七年新疆发生的事情吗？这些再教育营究竟是什么，中国政府在新疆的政策目标是什么？

郑国恩（以下简称郑）：这些所谓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其实是中共在延续和完善他们自 2000 年初针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洗脑和转化所发展出来的高压模式。这场在新疆的运动是通过政策实验逐步发展起来的，反映出政策在实践中的“试错”特性，这一模式可以追溯到毛泽东时期。从那时起，政府开始测试和调整不同的政策。2013 年，中共明确了“去极端化”的需求，认为维吾尔人和其他被认为或被声称受到宗教极端主义影响的群体需要被“转化”。北京自此在该地区的工作重点转向去极端化。2014 年，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的讲话确立了在新疆推行去极端化政策的方向。随后，政府在 2014 年底和 2015 年间开始建立了首批全职且戒备森严的再教育或去极端化设施，到了 2017 年初，原西藏党委书记陈全国被任命为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随之而来是大规模的拘禁运动，这一运动在 2017 年初迅速展开，并可能在 2019 年底或 2020 年初结束。

郭：您提到新疆当局的这场大规模拘禁运动可能在 2019 年左右结束。这时候意味着拘禁已经结束？您所描述的去极端主义、再教育的洗脑灌输是否还在继续？

郑：灌输教育仍在继续。政府发起的这场大规模拘禁运动是为了对人口进行分类。这些拘禁营地既有灌输教育的功能，也有过滤、筛选维吾尔人口的功能。我们观察到一个趋势，即许多受过教育的或者被认为对政府构成潜在威胁的维吾尔人，往往被判处长期监禁，同时，政府扩大了监狱和高安全级别的拘押设施的容量。而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贫困的底层维吾尔人，则被转移到强制劳动体系中。值得注意的是，自 2020 年以来，非法拘禁的现象仍在继续，其他少数民族群体也遭受非法拘禁。然而，这些拘

禁并非是在所谓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的政策框架下进行的。

郭：您刚才提出了一个概念，即通过不同机构对维吾尔人口进行过滤筛选，比如进入监狱或强制劳动场所。那么，对于强制劳动，中国政府是否有更长期的目标？比如，是为了通过过滤筛选改造这些被拘禁的维吾尔人，还是出于经济需求，强制他们提供劳动力？

郑：首先，我们需要区分强制劳动的不同目的。第一种强制劳动主要将“再教育营”的人员释放到有监管的强制工作场所。其主要目的是强制这些人融入以汉族为主的社会，而不是让他们在接受“再教育”后恢复自由。通过安排他们在汉族人经营的工厂工作，这实际上设计了一种强制性、高度控制的过程，迫使他们融入以汉族为主导的社会。有些人可能几个月后会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但更多人则继续从事各种形式的强制劳动。在我看来，释放再教育营人员进入汉族人所经营的强制劳动工厂，主要不是为了提供额外的劳动力，而是设计一种强制性的、高度安全化的流程，强迫被释放的维吾尔人融入以汉族为主导的社会。

第二个也是规模最大的强制劳动系统，与集中营无关，是通过劳动转移和就业扶贫体系进行的。这个系统在 2017 年的大规模拘禁运动的同时得到大幅强化。尽管早在 2000 年初就有类似的就业扶贫项目，而且并非总是强制性的。但在陈全国主政新疆期间，该系统变得高度强制化，而在现任新疆党委书记马兴瑞的领导下，进一步扩大并持续执行。这是一种通过就业扶贫的名义，将新疆的少数民族农民强制带走，送到全职强制劳动点（一般是工厂）工作的计划。

因此，大规模拘禁运动应被视为新疆“非常态化”管理的核心，它伴随着包括强制劳动在内的一系列辅助政策，这些政策一起构成了中国政府在该地区实施的强制性社会改造。通过强制性扶贫就业和强制劳动转移，维吾尔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注意到，维吾尔儿童从幼年就被送到全日制寄宿的学校，被迫与父母分离。同时政府通过节育等手段在新疆实施人口控制，针对宗教的镇压也在持续。因此，继大规模拘禁运动之后，这些并举的政策正在持续改变和摧毁维吾尔社会。我认为，大规模拘禁运动与所谓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这一社会改造计划的核心，成为镇压维吾尔社会反抗的最极端的、最有代表性的工具。正如前公安部部长赵克志所说，政府的目标是“拘禁新疆每户至少一口人”。¹ 然后对被拘禁者进行筛选，同时通过其他辅助政策加强政府对社会基层的渗透能力。所以总的来说，这是一项全面的社会改造计划。

郭：您提到大规模拘禁运动导致了一种暂时的“非常态化”，并伴随着其他社会重塑项目同步进行。那么这个暂定的“非常态化”有没有常态化的可能性？警察式政权目前还存在吗？比如说，新疆警察为了监测“极端主义”或识别潜在拘捕对象的监视技术，会不会形成新疆的“新常态”？

郑：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事实上，这种能够在短时间内进行大规模监控和拘禁的高科技警察政权，早在大规模拘禁行动之前就已建立。在拘禁行动期间，明显的目的是通过拘禁来恐吓公众。然而，正如陈全国在2018年一次内部讲话中提到的将警察政权背景化的必要性，²表明新疆当局早就打算在保持警察制度运作能力的前提下，减少其表面上的可见度。因此，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背景化”的监控和警察国家。它保留了同样的警力和人力来监控和控制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但为了展现出新疆的新面

貌——特别是面向汉族游客——它试图营造出一种平静、和谐的表象。但在这种表面之下，隐藏着一个庞大的警察系统，有数百万维吾尔人仍在承受着心理创伤，他们曾经历拘禁、强制绝育和警察的恐吓。

郑：您提到了数百万维吾尔人因上述经历而遭受心理创伤、同时中国政府向汉族民众辩解这些行动的合理性，似乎也暗示了新疆的未来发展。请问，您认为中国政府在新疆所采取的这些措施和政策会导致哪些后果？比如，是否会加剧在新疆社会中维吾尔和汉族之间的紧张冲突吗？

郑：首先，从外部来看，这种情况很难进行独立、客观的评估。我们知道，民族团结政策已被强制执行，甚至比以往更要严格。维吾尔人被灌输了这样一种观念：任何形式的反抗政府的行为都会遭到严厉的惩罚。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可以想象维吾尔人是如何生存的：表面上，他们看似服从政策，但内心却被撕裂、充满创伤，因为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人曾经被拘禁，或者仍在被拘禁。我指的是，至少有几十万维吾尔人至今下落不明，可能被关押在高度戒备的设施或正式监狱中。在这种情况下，维吾尔社会的深度创伤只会继续加剧，而他们的反抗似乎已被彻底粉碎。至于长远的后果和结局，目前还没有人能够预见。

郑：根据您调查的证据和文件，是否有迹象表明，中国民众（除新疆外）接受并支持新疆最近出现的这种警察政权的这种新常态？是否有迹象表明民众对这些政策感到不满或有抵触情绪？

郑：中国政府特意将这一切以一种“成功”的形象传递给国内民众，强调这些措施是应对恐怖主义袭击所必需且有效的。因此，这种宣传赢得了大

多数汉人的支持，使他们相信政府在新疆采取的措施是合理且必要的。总体来说，无论是在新疆以外还是新疆内部的汉族社会，都存在相当强大的支持力量。当然也有一些汉族人持批评或关切的态度，但这些声音并不占主导地位。因此，在很多方面，中国政府赢得了大多数汉族人的支持。当然，大多数汉族人并不了解拘禁的实际规模或其中的残暴行为。他们只是被告知，有一些维吾尔人被监禁，而另一些只是接受职业技能培训，以帮助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以防止他们因教育水平低而受到恐怖分子的诱惑。这就是现状。当然这也是中国政府长期无视外国舆论和国际批评的基础。因为总体上，中国国内对其新疆政策的支持仍在继续。

郭：能否给读者举一些例子，说明哪些行为会导致维吾尔人被关押在这些监狱或再教育设施中？中国政府认为什么样的行为是“极端主义”？

郑：当然。在2014年，中国政府发布了一份包含七十五种“极端主义”行为迹象的清单，其中包括年轻人留胡须，穿着保守的伊斯兰服装，女性戴面纱，以及父母拒绝将孩子送入公立学校（因为公立学校主张世俗主义），抵制地方政府的政策（如扶贫），或对国家或者汉族人持有消极印象。

此外，2020年曝光的《墨玉名单》(Karakax List)等内部文件显示，维吾尔人被拘禁的原因有时很简单，比如他们在葬礼上按习俗祈祷，超出计划生育政策多生了一个孩子，再比如听了宗教布道，甚至是在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参与的活动。即使是一些完全无害的伊斯兰文化表达，哪怕发生在二十或二十五年前，都可能导致他们被溯及既往地惩罚和拘禁。

郭：从表面上看，政府宣传这是一项打击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计划。然而，

可能会让国际社会感到惊讶的是，您已经多次提到的族群人口控制和管理的部分。您刚才提到，有人因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而被拘押。为什么除了打击宗教和文化习俗之外，所谓的“违法生育”也成为打击的对象？为什么族群人口控制成为此次拘禁和再教育运动的一部分？

郑：我在研究中发现，许多中国学者官员表达了他们对维吾尔人口增长的担忧。这些所谓的“学者官员”就是担任政府职务并受到政府资助的学者。其中甚至包括一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高级官员，³他认为快速增长且高度集中的维吾尔人口可能助长分裂主义情绪，并促使维吾尔人认为这片土地只属于他们，并主张独立等。因此，中国政府采取措施“优化”新疆的民族结构，一方面通过劳动力转移、强制劳动等方式强迫维吾尔人离开他们的家乡，另一方面则通过大规模节育措施来抑制其人口增长。中国政府认为，维吾尔人口的快速增长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很明显，一个人口增长缓慢或数量较少的群体，更易于控制和监视。实际上，新疆当局花费了很大精力将大量维吾尔儿童强迫送入寄宿制学校。为了控制维吾尔人口，警察面临很大的挑战，因此人口控制成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郭：中国政府制定这些政策是基于对维吾尔人口增长的担忧并视其为对国家安全严重的威胁，那么这种人口规划的政策是否构成种族灭绝呢？

郑：根据我的研究，首先，我查明了维吾尔人出生率急剧下降的事实，这一事实符合1948年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犯罪的五个标准之一，即阻止受保护族群出生率的犯罪。另一方面，我也确认了中国政府试图阻止维吾尔人口增长的明确意图。要认定种族灭绝，确定意图至关重要，而中国政府的意图正是减少并控制维吾尔人口。因此，我认为，我

们看到了确凿的种族灭绝在新疆的高风险迹象，而且这一进程仍在继续。当然，是否构成种族灭绝还需要法律专家的裁定。但根据我的研究和评估，一些法律专家，诸如独立法庭以及美国政府和十多个国家的议会，已经认定中国政府在新疆的做法构成种族灭绝。

郭： 您能详细谈谈这些国际法律裁定和倡导努力吗？您认为它们对新疆的情况产生了任何影响吗？

郑： 中国政府非常关注这些事态的发展。美国政府已经做出了种族灭绝的裁决，加拿大、法国、英国等多个国家的议会也通过了决议，称新疆的情况构成种族灭绝。伦敦还成立了由资深检察官杰弗里·奈斯爵士 (Sir Geoffrey Nice) 主持的独立维吾尔特别法庭 (The Uyghur Tribunal)。此外，今年七月海牙举办了世界公民法庭 (The People's Tribunal)，法律专家经过审视证据后裁定中国政府具有灭绝一种受保护族群的全部或部分的意图，使用的各种手段包括我认为最核心的措施，即阻止族群的生育。作为一名研究人员，我看到了种族灭绝的高风险迹象，尤其是由于中国政府对数据的刻意隐瞒。自从我在 2020 年中期发表了关于生育控制的开创性报告后，⁴ 中国政府已停止公布出生率数据，但我必须说，真正对中共暴行产生有效影响、让其付出代价的措施，是关于惩罚强迫劳动的法律，美国通过了《防止强迫维吾尔劳动法》(Uyghur Forced Labor Prevention Act)，欧盟的相关立法将在三年内生效，许多公司被迫退出相关供应链。我认为这些措施已经在经济层面产生了影响，使那些实施暴行的人无法从中获利。

郭： 我想求证一下，您是怎么确认您获得的政府文件的真伪性？这些文件是否有可能是伪造的，或者由人工智能生成的？您是否遇到过无法确认真

伪性的材料？

郑：我从未遇到过我认为是不真实或分析后发现不真实的文件。不过，有时我收到过一些孤立的文件，它们的内容不够重要或者分析它们的价值不大。有些文件附有很多重要的鉴定标记，例如原始印章和签字。这些文件内容与政府公开的政策及其他公开证据完全一致，而签字的官员也是我们能够确认的。有时，我们还会通过其他文件进行交叉佐证。例如，《新疆文件》(Xinjiang Papers) 中的一份叙述新疆历史的官方版本的文件，在《新疆公安文件》(Xinjiang Police Files) 中找到了一份完全相同的文件，并附有正式签字与标记，因此可以百分之百地确认其真实性。

《新疆公安文件》是通过黑客入侵警察电脑获取的最大一批档案，不是从内部泄漏的。其真实性可以通过以下事实得到证实：文件中包含数千张拍摄于拘押所的人员、警察和拘押所本身的照片，还有许多警察行动和演习的影像，数百份警察培训材料的幻灯片，数万份文件，以及来自该地区的图像资料和大量的维吾尔语资料。试图伪造或使用人工智能来生成这样一批文档，我认为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们对许多文件进行了多重验证、包括交叉验证和三方确认。此外，如果想伪造如此大量的文件，那是需要深入新疆收集情报的。

郭：您提到泄漏的政府机密文件当中包括维吾尔语的文件，这让我想起，您之前写过的一篇期刊文章，⁵ 提到维吾尔警察在新疆的警务、监视、参与拘禁行动。这可能会让国际社会感到意外。请问，维吾尔及其它少数民族的警察在这些行动当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郑：维吾尔文的文件通常是与法院相关，或者是提供给不会讲汉语的当地居民的通知和指示。但最重要的文件大都是中文写的。我的研究表明，在大规模拘禁运动开始的几个月前，中国政府招募了数千维吾尔警察来填补该地区的警力需求。毕竟，并非所有汉族警察愿意被派往维吾尔人聚居的地区，而且汉族警察的薪酬通常较高。大多数被招募的维吾尔警察都是辅警，薪资较低，且随时可能被解雇。新疆当局招募这些警察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监控当地人，因为他们能够理解并监视维吾尔人的语言和行为。

郭：您是怎么回应中国政府对您的研究的否认和谴责的？关于新疆人权危机的外国报道和研究，中国政府称这些报道是在散布谣言，旨在诽谤中国政府的国际声誉、阻碍中国的崛起。您是否担心，与中国关系紧张的外国政府会利用新疆状况做为借口来谋取自身利益？如果这种情形存在的话，您有没有遇到过外国政府或组织对您的研究施加压力的情况？

郑：我遇到的情况恰恰相反。许多外国政府对中国政府在新疆的暴行关注不够甚至完全不予理睬。考虑到这一暴行的严重性——这是自从纳粹大屠杀以来规模最大的针对少数民族及宗教信徒的拘禁运动——各国本应对此高度关注、表达强烈关切，并对作恶者采取反制和制裁措施。如果他们不采取行动，就是背离基本的人道主义。

我不排除有些政治团体，特别是右翼团体，可能会利用这一局势来达到其政治目的，但我没看到这种情况是主导因素。相反，最令人担忧的是国际社会缺乏对侵犯人权行为的合理关切，更缺乏实际行动。尤其令人失望的是，全球南方 (Global South) 的穆斯林国家对这些暴行的冷漠反应。穆斯林国家的精英阶层似乎被中国政府的“一带一路”等外交手段所收买。联

合国，甚至是联合国人权高专办自从发布了一份报告后，几乎再没有采取任何后续措施，我对此也深感失望。虽然有一些闭门讨论，但也并未取得实际进展。此外，欧洲国家的反应也较为软弱，尽管它们最终通过了关于制裁强迫劳动的立法，但其力度已被严重削弱，未能真正发挥作用。

郭：您希望联合国或欧洲国家采取哪些具体措施呢？例如，更多针对强迫劳动的法律制裁吗？

郑：中国政府应该在联合国，尤其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受到严厉的谴责和外交制裁。中国在联合国的部分权利和特权应被暂停，直至其纠正错误为止。针对中国的外交和经济制裁不能仅限于打击进口强迫劳动产品的措施，还应包括更广泛的真正的制裁措施。美国政府应更多地使用《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Magnitsky Act) 来制裁那些负责新疆暴行的中共高官，而不仅仅是陈全国。值得注意的是，欧盟甚至没有制裁新疆前党委书记陈全国！欧盟仅对一些低阶官员采取了制裁措施。所以，我们需要采取更有力的措施。

郭：关于这场危机是如何形成的，我想引用您在 2018 年发表的关于新疆状况的第一篇学术文章，您写到：“再教育运动是中国‘反恐战争’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的缩影”。⁶ 当您使用了“反恐战争”(War on Terror)一词时，您是否意味着中国的反恐战争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有联系？中国政府在新疆施行的政策，是源于美国反恐战争吗？还是根植于国内的原因？抑或是二者的结合？

郑：实际上，在那之后我就没有使用“反恐战争”这种说法了。这个观

点是肖恩·罗伯茨 (Sean Roberts) 在《对维吾尔人的战争》(The War on the Uyghurs) 中提出的。他特别指出，中国政府在“9-11”事件后借用了美国的“反恐战争”框架，以便掩盖其针对维吾尔人的强制同化政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正确的。我的意思是，中国确实在战略上借用了美国的“反恐战争”框架来推动自己的议程。但我没有过多地关注这一点。我觉得很多研究新疆的学者，对美国是否在某种程度上无意中帮助了中国以反恐战争为名而迫害维吾尔人的问题很感兴趣。而我的研究重点更直接地放在中共的政策、思想和偏执上。2022年，我使用了“政治偏执狂”这个来自于种族灭绝和大规模暴行研究的术语，来描述我在《新疆公安文件》中看到的情况：这是一种将维吾尔人视为人类威胁和国家安全风险的极端偏执。我使用这个词是想解释为什么中国政府认为妇女、青少年、老人、弱者需要全副武装的警察来控制。他们甚至在所谓的“职业技能培训中心”的瞭望塔上架设军用机关枪，就好像有人会试图袭击再教育营一样。陈全国以及其他官员的讲话都充满了极端的偏执感，因此我使用了“政治偏执狂”这个词。当然，正如曾锐生 (Steve Tsang) 等其他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列宁主义一党专政的国家往往极端偏执且多疑，时刻担心自身的安全。

郭：除了列宁主义政治制度之外，这种“政治偏执狂”还有哪些其他来源？这种偏执的程度与该地区的恐怖主义威胁或地区不稳定局势是否成正比？

郑：这与恐怖主义威胁完全不成正比。从追求政权绝对安全与控制的角度来看，这种偏执是可以理解的。也就是说，中国政府意识到其无法完全控制维吾尔人且无法渗透进维吾尔社会。维吾尔人不愿意被中国政府统治，而中国政府也无法改变他们或说服他们效忠共产党。所以，从政权安全的

角度看，这种偏执源于他们意识到无法完全控制维吾尔人。但我认为，政府后来采取的政策与完全掌控的愿望并不相符，这种偏执实际上是对威胁感的极端夸大。

郭：您在2018年写道：“正如新疆已成为中国尖端监控技术的试验场一样，中国政府可能会利用在新疆再教育大量穆斯林少数民族的经验，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社会改造。”⁷在这次采访的开头，您也提到了这些新疆镇压政策的一些起源，是源自中国政府在其他地区监禁法轮功学员时发展出来的政治灌输手段。此外，陈全国在被调任新疆之前，也曾在西藏担任党委书记。由此可见，这些政治措施是从新疆以外的地区传到新疆的。回到您的引述——在2018年写下的这一预测，对于中国目前的状况来说，在多大的程度上实现了呢？有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在新疆采取的社会再造措施，已经开始从新疆反向推广到中国其他地区？

郑：中国政府已在香港采取了类似于新疆的措施，虽然形式有所不同，但也是政治再教育的一种体现——不是通过大规模拘禁，而是通过教育体系对公众进行思想改造。香港的抗议活动被定义为“极端主义”，并强调打击极端主义的必要性，通过学校的“反极端主义”框架向学生灌输政治理念，同时对被拘押的抗议者进行再教育。当然，香港人早已预见到这一点，这也是他们在2019到2020年大规模的抗议的原因之一。值得注意的是，部分香港警察还曾前往新疆学习当地的镇压和监控手段。另外，2020年后的新冠疫情封锁期间，中国政府以社会基层管理与地方胁迫为手段，施行大规模封锁。这也展现了类似的监控模式——监视及控制着民众的活动、使用接触者追踪等极端手段，对整个社会进行全方位的监控。在这些同时发生的事件中，我确信不同政策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新疆成了一个实验场，

中国政府及安保公司在这里对维吾尔人进行测试，并使用其他地方难以推行的高侵入性技术。我相信新疆的拘禁运动、人口控制及监控手段与新冠疫情清零政策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尽管这仍是一种普遍观察，没有充分的证据直接证明这一点，但这些关联是已经存在的事实。

郭：这可能是进一步的猜测，但您是否注意到有其他国家对中国在新疆实施的这种社会控制模式感兴趣的迹象？中国的这些措施是否与其他国家有相互影响？

郑：我们看到所谓的“智慧城市”（Smart Cities）的输出——这些城市具备全市范围的控制、监控、安全和管理系统，包括能源消耗、街灯摄像头的智能控制等。这些技术已输出到中亚（比如吉尔吉斯斯坦的比什凯克），以及津巴布韦等地。许多政府对中国所开发的技术以及新疆经验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虽然智慧城市和监控技术在中国新疆以外也广泛存在，但在新疆的部署规模前所未有的，达到了极致。

郭：就对未来短期和长期的预测而言，您认为中国政府在新疆的各种政策有可能缓和或扭转吗？在新疆近几年发展出来的高度安全化警察制度的这种新常态是否已经踏上了不归路？

郑：在新疆，正如中国其他地方一样，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政府致力于对社会的绝对控制，甚至提前塑造人们的思想。这样做的目的是尽可能发挥先发制人的行动能力，能够在问题爆发之前就预测到这些问题，并阻止人们组织起来进行反抗。因而，我们看到了全面的高科技监控手段，尽管这些手段仍依赖大量人力。这就很像一个毛时代的中国，或者也可以跟纳粹

德国相比。在纳粹德国，每个街区都有由政府授权的代理公民监视邻居。毛泽东时代也是通过庞大的基层控制网络来维持对社会的严格掌控。如今，在习近平的领导下，这种全方位的控制得到了延续。

以扶贫为例，现在已不再像以前那样的——以前这些项目计划模糊，在某程度上是自愿的，而且官员的监督不够严格，渗透到社会基层的程度也有限。然而现在，官员挨家挨户地收集数据，询问当地人为什么不接受扶贫项目安排的工作之类的问题。这种有针对性的人口管理、治理和扶贫，具有高度侵入性和控制性，对每个人都建立了数字档案——这就是当下所看到的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所采取的方法。当然，这种做法在西藏和新疆尤为突出。

郭：在中美关系日益紧张背景下，您认为中共在新疆的政策在未来是否会变得更加激进？

郑：表面上看，中国政府似乎在意中美紧张局势，但实际上，习近平最关心的是国内民众的反抗。其实，美国对中国（国内政治）的影响非常有限。虽然美国正在限制高科技出口和贸易，但这与中国国内的基层治理与安全管控无关。中国政府害怕自己的人民，就像东德的共产党政权那样，修建了一堵墙阻止公民前往西方。这种对自己人民的恐惧驱使着中国政府推行渗透到基层的监控措施。我不确定这个情况怎么再恶化。从社会安全化的角度来看，中国政府已达到像朝鲜式的极端程度。还能变得更极端吗？当然有可能，不过我认为习近平领导下的政府已经到达了极限。

郭：您提到毛泽东时期的中国、东德、纳粹德国，这些政权最终都崩溃了

或未能成功延续。那么相比来说，习近平的政权还能持续多久？您觉得这个政权多久之后可以走上一条政治改革的道路？

郑：我认为这个政权非常脆弱。像这样具有高侵入性和全方位渗透的国家存在着高风险，可能会走向极端并逐渐失去民众支持，并面临遏制自我调整和改革创新的巨大风险。中共之所以能生存到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邓小平改革开放时期的创新与应变力。在毛时期，毛泽东通过纯粹的革命激情来控制整个国家，缺乏任何替代方案。当时的中国在国际上完全处于孤立状态，国内也没有任何反抗的可能性；但在当下，习近平正面临着这种适应性下降和政策僵化的双重风险。这就导致了创新和技术突破的减少、经济增长的放缓，和公民创新动力的减弱。习近平对中国的高科技企业与创业者持有警惕的态度。像马云这样的成功企业家现在基本上已经被边缘化了。我认为这是个坏消息，不仅对中国人民不利，甚至对中共的长期生存不利。然而，这些风险因素并不会自动转化为政权更迭或崩溃。中国的未来走向确实非常难以预测。

郭：我理解这种政治前景难以预测。《中国民主季刊》的重点是中国的民主改革与转型，假设习近平时代结束后或甚至共产党时代结束后，中国出现了一个民主化的政府，您认为在新疆将要面临什么样的政治挑战？换句话说，新疆目前的人权危机，只是源自共产党的统治，还是更深层次的中国对新疆统治的本质问题？

郑：中国社会长期充斥着大汉族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这些问题可以追溯到帝国朝代时期，即主张中国是文明的缩影，天然可以统治文明程度低的民族。因此，在中国，任何民主化的中国政府在面对少数民族的问题时，

都必须怀有谦逊和自我批判的反思态度，认真思索其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尤其对于新疆的现状。假设中国将来真的实现民主化，不可避免的是，维吾尔人与西藏人的一部分会强烈要求独立，他们不愿意继续接受汉人的统治。如果中国实现了民主化，那么民主化的中国就不能继续压迫他们，而是让他们得到自由。不过，这是一个非常遥远的设想。作为一名研究者，我不参与政治活动，也不就维吾尔或西藏独立发表个人意见，但为了回答你的问题，我想到了这一点，这也是未来的民主中国政府或过渡政府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郭：郑老师，非常感谢您接受访问。您的回答一定会对本刊那些关注中国民主转型前景的读者有所启发，帮助他们更深入地了解新疆人权危机以及背后深层的制度根源。

郑：谢谢你，也感谢《中国民主季刊》，我很荣幸能够参与此次讨论。

（此对话用英语进行，感谢余浩风博士为译成中文所提供的协助）

注释.....

1 郑国恩：《朝着“健康”的心态，彻底改造他们：中国在新疆的政治再教育运动》，《中亚概览》第38期（2019年1月2日），102-28页（Zenz, Adrian. “‘Thoroughly Reforming Them towards a Healthy Heart Attitude’: China’s Political Re-Education Campaign in Xinjiang.” *Central Asian Survey* 38, no. 1 (January 2, 2019): 102–28. <https://doi.org/10.1080/02634937.2018.1507997>. pp. 114-5)

2 郑国恩：《对新疆文件的分析：呈维吾尔独立法庭》，2021年12月9日，第

- 12-15 页 (Zenz, Adrian. “The Xinjiang Papers: An Analysis for the Uyghur Tribunal.” December 9, 2021. <https://uyghurtribunal.com/wp-content/uploads/2021/11/The-Xinjiang-Papers-An-Introduction-1.pdf>, pp. 12-15)
- 3 郑国恩：《“终结维吾尔族的主导地位”：对北京在新疆南部人口优化战略的分析》，《中亚研究》40 卷 3 期（2021 年），291-313，第 296 页 (Zenz, Adrian. “‘End the Dominance of the Uyghur Ethnic Group’: an analysis of Beijing’s population optimization strategy in southern Xinjiang.” *Central Asian Survey* 40, no. 3 (2021): 291-313. <https://doi.org/10.1080/02634937.2021.1946483>, p. 296.)
- 4 郑国恩：《绝育、宫内节育器和强制节育：中共抑制新疆维族生育率的运动》，詹姆斯敦基金会，2020 年 6 月 (Zenz, Adrian. “Sterilizations, IUDs, and Mandatory Birth Control: The CCP’s Campaign to Suppress Uyghur Birthrates in Xinjiang.” *Jamestown Foundation*. June 2020.)
- 5 郑国恩和詹姆斯·莱博德：《新疆的安全化：警察招募、非正式警务和少数民族的合作》，《中国季刊》（伦敦）242 期（2020 年 6 月），324-348 页 (Zenz, Adrian and James Leibold. “Securitizing Xinjiang: Police Recruitment, Informal Policing and Ethnic Minority Co-opta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London)* 242 (June 2020). 324-348. <https://doi.org/10.1017/S0305741019000778>.)
- 6 同注 2。
- 7 同注 2。



黄奕信画作